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及其特点的再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是传承道统的中国文化*

方 铭**

以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即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指是什么，包含哪些核心内涵？只有搞清楚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我们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十二个关键词的内涵。

一、传统的本义

“易姓为代，传统为朝”^①，自夏后启开辟废禅让而实行世袭制度，开始了“天下为家”的时代。“传统”一词，本义用于说明政统传承在纯粹性和系统性基础上的合法性，即在同一姓之间嫡系体系中的传承。如《后汉书·东夷列传》说：“倭在韩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国皆称王，世世传统。其大倭王居邪马台国。”^②倭国即今日本国，“世世传统”指倭国王位传承，一直在有血缘关系的宗亲之中传承。

又《通典·孙为庶祖持重议》载南朝宋礼学家庾蔚讨论孙应为

* 本文为2015年北京社科研究基地重点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研究”相关成果，项目编号为15JDWYA001。

** 方铭，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孔子与儒家文化研究所教授。

① [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四，内篇四《释通》，3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② [南朝宋]范晔撰：《后汉书》，卷八十五，28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庶祖服重服时，也提到了传统的问题：“祖庶父嫡，已承父统，而不谓之继祖，则祖谁当祭之？所谓继，是承其后，为之祭，故云传重而服之斩。若杜琬所言‘祖父俱嫡’，乃是继曾祖耳。祖虽非嫡，而是己之所承，执祭传统，岂得不以重服服之乎？已服祖以斩，故祖亦服己以周。长子之服，义则不同，要须己身承祖祧之正，乃得为长子斩。按小记云‘庶子不得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祧’，是明庶子不继祖祧，故不得为长子斩，非据子之身。若据长子身，不得云不继祧也。”^①

政统的传承中的“统”的问题，有的时候是会引起极大纠纷的。明朝的“大礼议”事件，既说明中国古代君臣之间的民主风气，更说明明朝众臣对于政统传承的严肃态度，而这个事件的关键，就是检讨中国古代的“传统”问题。

明正德皇帝武宗去世后，无子，武宗的母亲孝宗皇后和内阁议决由兴献王的长子、武宗的亲叔伯弟弟朱厚熹继承皇帝位，此即明世宗嘉靖皇帝。兴献王是明弘治皇帝明孝宗之弟，嘉靖皇帝在即位之时，就与朝廷大臣因为“传统”问题发生争执，内阁认为应该用太子礼迎接嘉靖皇帝即位，即朱厚熹由东华门进入，居于文华殿，但嘉靖皇帝认为“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不愿意受太子礼，最后皇太后令群臣上笺劝进，嘉靖皇帝“入自大明门，遣官告宗庙社稷，谒大行皇帝几筵，朝皇太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②。嘉靖皇帝即位后，与内阁大臣杨廷和、毛澄等因为谁为嘉靖帝宗法意义上的父亲，以及嘉靖皇帝的生父兴献王的尊称问题发生了争执，这个论争持续了三年半。

据《明史·席书传》载，曾提携过王守仁的席书，明世宗嘉靖时期以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见中朝议“大礼”未定，而反对嘉靖

^① [唐] 杜佑撰：《通典》，卷八十八，《礼》四十八，《沿革》四十八，《凶礼》十，24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② [清]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十七，《本纪第十七世宗》，215~21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皇帝的大臣们常常引宋英宗的故事作为根据，席书认为嘉靖皇帝和宋英宗的情况不同：“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为人后，今上以兴献王长子入承大统。英宗入嗣在袞衣临御之时，今上入继在宫车晏驾之后。议者以陛下继统武宗，仍为兴献帝之子，别立庙祀，张璁、霍韬之议未为非也。然尊无二帝。陛下于武宗亲则兄弟，分则君臣。既奉孝宗为宗庙主，可复有他称乎？宜称曰‘皇考兴献王’，此万世不刊之典。礼臣三四执奏，未为失也。然礼本人情，陛下尊为天子，慈圣设无尊称，可乎？故尊所生曰帝后，上慰慈闱，此情之不能已也。为今日议，宜定号曰‘皇考兴献帝’。别立庙大内，岁时祀太庙毕，仍祭以天子之礼，似或一道也。盖别以庙祀则大统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称则至爱笃而本支不沦，尊尊亲亲，并行不悖。至慈圣宜称皇母某后，不可以兴献加之。献，谥也，岂宜加于今日？”^① 宋英宗在仁宗在世时过继给宋仁宗当太子，而嘉靖皇帝是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入宫继承王位的。虽然嘉靖皇帝继承了武宗的皇位，但仍是兴献王之子，应另为兴献王立庙。但皇帝不能有两个，嘉靖皇帝与武宗虽是兄弟，却也是君臣。孝宗皇帝是宗庙神主，亲生父亲应称为“皇考兴献王”，可在宫廷中立庙，太庙祭祀以后，仍用天子之礼在宫中祭祀。

席书的主张，深合嘉靖皇帝之意，最终称为调节双方争执的折中方案。席书的上书，两次提到“传统”一词，认为三代“传统之礼”坏于汉、唐之世：“三代之法，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自夏历汉二千年，未有立从子为皇子者也。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统之礼。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终不称濮王为伯。今陛下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乃不继武宗大统，超越十有六年上考孝宗，天伦大义固已乖悖。又未尝立为皇子，与汉、宋不同。自古天子无大宗、小宗，亦无所生、所后。《礼经》所载，乃大夫士之礼，不可

^①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席书传》，5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语于帝王。伯父子侄皆天经地义，不可改易。今以伯为父，以父为叔，伦理易常，是为大变。夫得三代传统之义，远出汉、唐继嗣之私者，莫若《祖训》。《祖训》曰：‘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则嗣位者实继统，非继嗣也。伯自宜称皇伯考，父自宜称皇考，兄自宜称皇兄。今陛下于献帝、章圣已去本生之称，复下臣等大议。臣书、臣璉、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仍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奉神主而别立祔室，于至亲不废，隆尊号而不入太庙，于正统无干，尊亲两不悖矣。一遵《祖训》，允合圣经。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①

二、传统与道统之传

“传统”本义所指政统传承的纯粹性和系统性，体现的是“传统”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既然以“传统”标榜，就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并不是可以随意定义的，或者具有无限包容性的，而是应该有明确所指的体现原初性、纯粹性和传承性的。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说：“爰自风姓，暨于孔氏，玄圣创典，素王述训，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设教，取象乎《河》《洛》，问数乎蓍龟，观天文以极变，察人文以成化。然后能经纬区宇，弥纶彝宪，发辉事业，彪炳辞义。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

^① [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一百九十七，《列传第八十五席书传》，5203～5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

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①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诗》《书》《礼》《乐》《易》《春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礼记·经解》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②孔子认为六经所标举，在于培养温柔敦厚，疏通知远，广博易良，洁静精微，恭俭庄敬的人格，欲人之不贼，不诬，不奢，不愚，不烦，不乱，而养志知事，行端性和，明乎阴阳名分。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六经受到了挑战。《庄子·天下》说：“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

^① [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一，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五十，见《十三经注疏》，3493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返，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①”在战国之前，六经之道一以贯之，而自诸子兴起，百家未能融会贯通六经之学，所以各执一词，不能兼备众善众美之纯正，所以，“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个意思，《汉书·艺文志》也曾有陈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②

由于诸子之徒对孔子之学的曲解，自战国时期始，如孟子、荀子、扬雄、刘勰、韩愈等人，就提出了原道、征圣、宗经的重要性，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传统文化的纯粹性。《孟子·滕文公下》云：“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③

原道、征圣、宗经，实际是为了说明道统与孔子的密切关系。朱熹《中庸章句序》曰：“《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尧之一言，至矣，尽矣！而舜复益之以三言者，则所以明夫尧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

① [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卷十下天下第三十三，见《新编诸子集成》，1062~10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② [汉]班固著，[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17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③ [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六下，见《十三经注疏》，5903~590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庶几也。”^① 即道统始于尧、舜，成于孔子。明归有光曰：“得圣贤之意，则可以知圣贤之言；知圣贤之言，则可以明道统之说。……圣贤之论，至孔子而定。继孔子者，孟子也。孔、孟，亲有之而亲见之者也。后之学者，当据之以为定，而岂可因之以为疑哉？……呜呼，道统之传，自孟子之后，得宋儒而愈白；自宋儒之没，而愈晦矣。章缝之士，耳剽目采，孰不曰周、孔，孰不曰颜、孟，言之日似，行之日远，斯道之真，亡灭坏烂，几于不振，此则有志者之所深耻也，主张斯文者所以为深忧也。”^②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政统的传承有时而斩，但道统的传承却历久弥新。如果把“中国传统文化”严格限制在“载道”的区域，就要树立“道统之传”自于孔子这个基本常识，如果在孔子之外寻求“道统”，显然是舍本逐末。近些年来，我们不断听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互相对立的评价，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会发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矛盾认识，就是缘于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画了等号。因此，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准确定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区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不同。

准确地说，“中国文化”内容应该包括“中国过去的文化”“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国固有的文化”，甚至包括“20世纪的中国文化”，其时间的长度和地域的宽度可以无限延伸，其内容可能涉及各个方面，有道有器，有粗有精，有伪有真。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本义而言，只应该是中国“传承道统”的文化，也就是那些传自轴心时代而体现人类文明方向的核心价值，是“载道”的文化。讨论国学教育问题，我们应该分清作为知识的专业国学教育和作为培养共同价值观的国学教育的区别。对于非专业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①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14页，北京，中华书局，2012。

^② [明]归有光著，周本淳校点：《震川先生集》，别集卷之一，710~7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的人来说，学习国学文化，应该突出重点，抓住核心，紧紧围绕“传承道统”这个中心，既可以节省学习者精力，又可以防止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多样性理解。

三、忠恕均平仁惠

孔子所倡导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其核心内容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简而言之，即孔子所谓“恕”，即把一切都看作是平等的主体；扩展而言，即孔子所谓“忠恕”，“忠”为尽己之道，“恕”为推己之道，有尽我所能的责任，有推己及人的立场；如果再扩展，就是“忠恕”“均平”“仁惠”，“忠恕”是个体行为准则，“均平”是社会运行原则，“仁惠”是国家的基本立场。

建立在“天下为公”这个基本出发点上的忠恕、均平、仁惠思想，完全包容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近代的文明成果即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而内涵则更为丰富和深刻。如果能以“天下为公”为基本出发点，以忠恕、均平、仁惠为核心价值，个人有“忠恕”德行，社会运行贯彻“均平”原则，国家能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仁惠”情怀，传承道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就达到了。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强调“仁”，仁的内涵无限丰富，不过，在孔子自己的论述中，他认为“恕”才是他终身奉行的基本价值。《论语·卫灵公》载，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

孔子以“恕”为终身行之之道，与孔子强调“仁”的重要性并不矛盾。《论语·雍也》载，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①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五，见《十三经注疏》，547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①《论语·颜渊》载，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②可见，仁即是恕，恕即是仁，都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上下功夫。

《论语·里仁》载，孔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③《礼记·中庸》载孔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④恕本身包含有对己对人的态度，所以，忠恕即恕，恕即忠恕。“忠”是正心诚意，敬业守信，是尽己之道；“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推己之道。我们平常所说的“良心”，就包含在“忠恕”之中。

孔子及儒家虽然强调礼的重要性，礼虽然有区别长幼秩序的意义，不过，孔子及原始儒家从来强调礼尚往来的重要性，礼从来都是对等的，而作为领导人，对礼的实现承担有首要的责任。《论语·季氏》载，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①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六，见《十三经注疏》，5385页。

②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二，见《十三经注疏》，5436页。

③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四，见《十三经注疏》，5367页。

④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五十二，见《十三经注疏》，3531页。

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①“均平”不仅仅是财富公平，也包括政治权利的公平，宋代革命者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革命主张，就是根植于孔子思想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是处理国内不同族群和不同阶层之间关系应该尊奉的原则，更是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的不二门径。

《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②大同之道就是均平之道，就是公平之道，就是公正之道。郭店楚简《唐虞之道》说：“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之方，爱天下之民。禅之传，世亡隐德。孝，仁之冕也。禅，义之至也。六帝兴于古，咸由此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③中国古代家庭伦理的孝悌观念，也是以天下为公为最高原则的。《唐虞之道》又说：“虞诗曰：‘大明不出，万物皆暗。圣者不在上，天下必坏。’治之至，养不肖。乱之至，灭贤。”^④虞诗是虞舜时代的诗歌，“举贤”和“养不肖”，“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体现了孔子赞扬的尧、舜时代具有的平等思想所包含的文明高度，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和未来所要实现的目标。

《尚书·尧典》说唐尧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

① [魏]何晏注，[宋]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六，见《十三经注疏》，5476页。

②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二十一，见《十三经注疏》，3062页。

③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157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④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158页。